

厦门侨乡变迁的探讨

——以厦门曾厝垵自然村为例

刘桔红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曾厝垵; 侨乡变迁

[摘要] 本文选择厦门曾厝垵自然村作为研究对象, 将口述访谈与文史资料相结合, 试图重构近代以来百余年间曾厝垵的历史, 并通过与塔头村的比较, 剖析一个侨乡从形成、发展到逐步衰落的过程。本文指出, 侨乡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必然有其兴衰的历程。任何地区的发展都是与时代、大地区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也只有找到真正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才能取得最大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06)02-0053-05

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 侨乡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李国暉教授《侨乡研究与华侨华人的建构》一文, 侨乡是“与海外乡亲联系密切, 受海外影响明显的中国移民的重要移出地”, 具有下列明显特征: 1、人口结构特征。海外乡亲数量众多, 归侨、侨眷人数在当地占有重要比例。2、海内外联系网络特征。3、海外经济影响特征(五多: 侨汇多、侨房多、侨办学校多、侨资企业多、侨眷公益事业多)。4、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1]。程希教授在《侨乡研究: 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一文中也提到, 界定侨乡的根本特征是侨民资源及移民资源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突出影响力^[2]。

学界对于侨乡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 但对侨乡历史的研究不多, 特别是对侨乡“衰落”的研究尚付阙如。事实上, 作为一个社区, 在历史变迁的

时代背景下, 兴衰演化自有其发展脉络。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侨乡在特定的发展背景及历史条件作用下, 会走向其逐渐“衰落”的阶段。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原有侨乡社区的发展迟滞, 而是其所具备的侨乡特征逐渐淡化直至基本消失。或融入整个时代或地区发展模式, 或同化于周边地区。本文就是希望通过对曾厝垵的个案研究, 来讨论它在近代东南亚变迁以及时代发展的大脉络下, 作为一个侨乡由盛转衰的历程。

一、作为侨乡的曾厝垵

(一) 向海洋发展的优势及传统

曾厝垵是厦门岛南部海滨的一个自然村, 现隶属于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珍珠湾行政村。据村庙

[收稿日期] 2006-04-05

[作者简介] 刘桔红, 女,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生。

石碑记载,曾家始祖光绰因兵乱率亲族由江苏常熟县到此避乱而定居,初称“曾处安”。

曾厝垵依山面海,居厦门港要冲。据《鹭江志》:“曾厝垵在厦门尽南,西扼海门,南对太武,东制二担浯屿之冲……内固厦门,外控担浯屿之冲……可驻大军。”^[3]据《厦门志》:“曾厝垵……为浯屿寨要害。”^[4]其中,“太武”为与曾厝垵相对的太武山,二担、浯屿是与曾厝垵相对的海中二岛,临近金门,于厦门海防、海道都有重要意义。清代曾在此设水师驻守。民国时曾是海军航空处所在地^[5]。

曾厝垵还有着天然良港的自然优势,自古就是出洋要地,与航海贸易有着很深的渊源。曾厝垵又称“曾家沃(澳)”、“曾厝湾”(厦门方言中“沃”指泊船海湾,“湾”指舟楫出入港口处)。据记载,曾厝垵“沙地宽平,湾澳稍稳,可避北风”^[6]。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廷在厦门曾厝垵设靖海馆,盘验船只,缉捕走私贸易。嘉靖四十二年(1563)靖海馆改为海防馆,管理海上事务,兼收引税和饷税。隆庆元年(1567),曾厝垵作为开禁后月港的督饷馆,管理商船出入海外,发放船引(准许船舶航行的凭证),盘验征税,是厦门港最早设立的港口管理机构^[7]。成书于1617年的《东西洋考》曾记载“从前贾舶盘验于厦门,验毕,移驻曾家澳候风开驾。”^[8]持出海许可证“引票”的出洋商船,从曾厝垵出洋前往东南亚经商^[9],闽南沿海居民,纷纷“往贩各番”贸易^[10]。曾厝垵还是清初偷渡至台湾的重要出海口之一。

采访中,很多村民谈到:“我们(曾厝垵)山水可口,又避海风,看看我们的福海宫那么红火就知道,我们这边是出洋的要地了。”村中的村庙福海宫与圣母宫都是供奉管理海洋的女神,历史悠久,香火

不衰。

曾厝垵处于山海之间,“地瘠民稠,不敷所食。”^[11]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良好的出洋移民环境,历练了曾厝垵人的航海造船技术和进取坚忍意志,最终形成了面向海洋发展的悠久传统,在南洋建立了众多的商业基地,建立了龙山堂等动态的、商业的跨国移民网络,为后来的侨乡繁荣起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二)昔日侨乡之盛

移民之乡 作为厦门港出海口,曾厝垵的居民早已开始了下南洋的经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厝垵达到了历史上出洋最兴盛的阶段,村中几乎所有的男青年都有过出洋的经历。鸦片战争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19世纪最后30年间,经亲友牵引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成为移民出国的主流,是自由移民出国的高潮期^[12],1926年,厦门港的出国移民达到最高峰^[13]。

在村中老人的回忆中,“上代基本都出国”、“上代都出洋了”。一位老人的父亲有八个兄弟,七个去了南洋。曾华荣老人的父亲、三个叔叔、两个堂叔全部都有出洋经历,他说起祖籍曾厝垵的著名华侨曾江水:“他不让父亲总在那里(南洋),叫他每年回来几次,因为村里都没有什么男人了,要他回来照顾宗祠还有孩子们。”由此可见,当时村中出洋之盛行。

南洋产业兴旺 曾厝垵移民多为自由移民,多去泗水和仰光等地经商。《厦门海关贸易报告》记载的自由移民就有曾厝垵的曾文扬等人^[14]。而且,曾厝垵人在南洋的商业颇有渊源。早在明末清初,就有曾举荐的亚历山大火药局脱颖而出^[15],他在新加坡专门制造火药,盈利极丰,成为首富,新加坡的“举荐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6]。

采访中,村民们都谈到了一些祖辈们在南洋的经商事迹。曾华荣老人讲:“我的三个叔叔是雇佣当地的土人抓海参发家的。一个叔叔做过仰光的商会会长,另一个叔叔在泗水做大米的生意,泗水的粮食后来基本上都是他在做了。”一位老人的父亲、姑丈在泗水经营布店。另一位老人说:“当时父亲有很多的大商号、批发站,父亲去世后,由堂叔他们照看,直到我大哥去那边继承。”

祖籍曾厝垵的著名侨领曾江水,上世纪20年代成为马来亚橡胶业首富,兼营地产、建筑,为马六甲华人社会三大企业家之一,曾多届蝉联马六甲中



▲曾厝垵的村庙——福海宫

华商会会长。他热心社会公益,多次捐巨款兴办马六甲、仰光、新加坡的中小学校。30年代慨捐巨款支持厦门大学。曾章武老人的房屋与曾江水的祖屋紧连,他们的祖辈曾交往甚密。他说:“听母亲讲,江水很有钱,新加坡有一条街都是他的。”

村民回忆及村中遗迹 曾厝垵南洋产业的兴旺,直接促进了本村侨乡的繁荣。老人们讲:“那时我们读书(小学)是不要钱的,而且还有干粮可拿;祖产有很多;早上经常吃燕窝,村里的孤儿寡母也都有钱照料,过年过节也会有红包。我们还有三个戏院,思明电影院、鼓浪屿戏院、龙山戏院。还有厦门第一个汽车公司,第一个飞机场,一到春节,钱就一直来。几头家的情况很多,上一辈每人有几个太太的情况很普遍。那时我们还有一个码头呢,就在和平码头那边,当时像陈、吴等大姓才有呢。”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大量的侨房,多在20世纪初修建。经过重修,很多依然美仑美奂。在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基础上大胆地融进了西洋建筑风格,其设计之恢宏、构筑之精巧、用料装修之考究、数量之多,在厦门亦属少见。如曾华荣老人居住的祖屋,几扇大门都是几百斤重的整块楠木,围墙四角都有精美的浮雕,屋顶雕梁画栋,院落也是几进几出,很有气派。

20世纪初在厦门的投资 20世纪初期正值厦门市政建设之时,曾厝垵的华侨满怀热情纷纷回厦投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厝垵华侨的经济实力:

1920~1937年,曾国沧独资经营进出口企业万成源行^[17];曾国办独立捐建了由大桥头起经镇北关、胡里山至曾厝垵的公路;曾厝垵至云梯岭14.4公里的公路,也是由曾国办等人投资的^[18];华侨银行,总部设在新加坡,1925年3月在镇海路设分行,曾国办任经理,资本达1000万余元,是南洋华侨金融的总汇机关^[19];曾国聪曾先后负责“成源栈”和“万成源”两家侨批汇兑信局^[20];思明戏院是曾国聪、曾国新于1927年投资兴建的,是华侨最早投资于厦门娱乐业^[21],最初投资24万,座位700个,每天客流量可达一万人^[22],戏院规模宏大,设备完全,为厦门最华丽舒适的电影院^[23],也是当时厦门市首家既能放映电影又能演出戏曲的戏院,由于归厦华侨常聚于此,又被称为“华侨俱乐部”。

曾国聪先生曾是印尼华侨商会会长,东南亚侨领之一,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好友,他应邀回厦投资。

据亲身经历当时情形的张人凤老先生介绍,当时曾国聪被尊称为“国聪伯”,其万成源行曾一度独占侨批业的六成,在1930年前被称为厦门首富,国民党的海军机场的土地就是他送给当局的。他在厦门兴办的烟厂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并在今汇景城附近修建了码头,修筑了原民国路,兴办了沿路商店,投资厦禾汽车公司,并请来了留美工程师周醒南共同设计规划厦门市政。

(三)与塔头村的比较

塔头自然村与曾厝垵同属思明区的滨海街道,是黄厝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宋时入住厦门。它与曾厝垵相邻,仅一壁之隔,百余年来发展历程却与曾厝垵截然不同,在曾厝垵的年轻男子倾巢而出奔向南洋的时候,塔头村却只有极少的人出洋,基



▲本文作者(女)在采访曾厝垵村民。

本靠务农为生,耕读传家。本文选择塔头村作为参照,以更深入地探讨曾厝垵侨乡的兴衰轨迹。

首先,19世纪末,曾厝垵已经有了小学,以不用学费甚至给以补贴的方式保证了绝大多数的适龄儿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采访到20多位的老人几乎都上过小学,而塔头村的老人却极少有人读过小学。其次,曾厝垵的老人们提到:“那时我们欺负他们,小孩子去抢他们的东西,他们也不敢怎样,而且很喜欢嫁女儿到这边,因为我们比较富”。第三,两村一山之隔,却被人们习惯地称作上禾山、下禾山,即城里乡下。第四,在曾厝垵村民的记忆中,塔头就是一个“水冷、土瘠、多病、交通不便、靠种地瓜为生的乡村”,塔头的老人们觉得“我们当时都是种地,很穷很苦,他们有很多人在外面(南洋)就会好很多。”

据《厦门志》:“塔头,厦华族(门第高贵之族),

其村傍水而居。世多科第。”^[24]尽管只有一个田野之隔,两村形成了一动一静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一面是殷富发达的侨乡,一面是苦守一方耕种的乡村。一个是流动的、商业的、跨国的社区网络,一个走的是精英的、正统的中心发展路线。从两村生产方式、村中剩余人口的构成、消费方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各方面来看,曾厝垵已经具备了一个典型侨乡的基本条件。

二、侨乡的衰落及转型

(一)曾厝垵与海外联系的疏远

曾厝垵作为一度与海外联系紧密的侨乡,其衰落首先与当时的社会大变迁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危机及东南亚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对于曾厝垵移民的影响并不太大。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厦门对外海上交通受阻,华侨出国、回国均告中断^[25]。曾厝垵的村民们提到了战争是海外华侨联系断绝的主要原因:“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抗战前期)回国的,一打仗,和外面(南洋)就联系不上了。”我的父亲在南洋很早就去世了,叔伯每月寄钱给我和母亲,一直到抗战,封了港,就从此断断了联系。”

抗战胜利后,陆路海路交通均未恢复正常。内战爆发后,政局动荡,谋生维艰,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无法落实,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入境限制更严,人民出入国规模自不及战前^[26]。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此时曾厝垵华侨回国的极少,联系基本中断。据《厦门华侨志》,在抗战胜利后至厦门解放前,由华侨集资或独资创办的工厂33家,却没有一家是曾厝垵的^[27]。

建国后,社会环境逐步安定,侨乡由单纯的消费型社会转向生产型社会,消除了出国谋生的部分推力因素;东南亚国家次第独立,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入境,像印尼政府自1953年起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入境^[28];加上解放初期,厦门港被封锁,出入境须绕道广州,殊多不便^[29]。曾厝垵面对金门,作为对台的海防前沿,政府对人口出入的控制更严。

“文革”期间,海外关系被斥为“反动关系”,人们害怕受海外关系连累,几乎无人申请出国,很少有华侨回乡。在采访中,了解到还是有一些人偷偷地回来。像曾天贵等老人提到“一直到文革初期都有人回来,还给我的母亲、姑妈带过咔叽布。后来就

没人再回来(被文革弄)怕了,文革中期很乱”。“70年代搞四清运动,内调外查,和海外的联系很少了。”文革时倒是有人偷跑回来的,但是没有人敢认啊,看到自己的堂哥都不敢讲话。”

改革开放后,广大侨乡纷纷利用原有的侨乡优势,促进当地发展;侨“牌效应”成为一张王牌^[30]。不过在曾厝垵,时代的变迁造就了世代的淡漠,如今村中与海外的联系是“远而不断”。村中蔡水保老人几十年来一直负责联系海外。打开他的通讯簿,就像是看到了一张遍布世界各地的有着曾厝垵人足迹的网络。他说:“老朋友们都不在了,下一代基本上没跟我们来往。村庙的捐款有一些是老朋友过世前叮嘱他们的孩子捐的。现在和我们联系的主要是新加坡的曾台萍,他是一个老朋友的侄儿,也是禾山公会的会员。”

(二)曾厝垵的转型

曾厝垵就像新中国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落,一路经历了土改、合作社、“文革”到改革开放,与之前的侨乡道路相比有了迥异的发展。

首先,从职业看,村中老人多以打鱼为生,外来移民多种地为主,还有的到“厦门市(即厦门老城区)工作。老人们讲:“解放后我们就不能不干活了,我们基本上都是打鱼,早年也做过船”“以前在村建筑维修队,后来参加了思明第三建筑公司”“以前做过小生意,大字(广告的招牌字)等”“我们曾厝垵村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种菜然后卖去厦门,我们后靠山,前面海,土地又不多,只好向海洋发展,抓鱼的很多。”塔头村的村民们说:“曾厝垵人在厦门工作的很多,因为他们在厦门比较有基础。”

这一点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曾华荣老人的四个儿子都是以打鱼为生;曾华朝老人的两个儿子一个打鱼、种菜种田,另一个在厦门的运输公司;曾华容老人的三个儿子分别在港务局、外经办、思明公安局;曾必庆老人的三个儿子分别在东渡码头、电业局、自来水厂;林金信老人的两个儿子都是在海沧公交公司;曾天贵老人的三个儿子两个在海沧公交公司,一个在厦门建筑材料公司。可见,其下一代的曾厝垵人已经融入了整个厦门的建设发展,下一代曾厝垵人基本上都是在读书,在此就不详加讨论了。

与塔头村的比较 之前我们是通过曾厝垵与邻村塔头的比较来凸现曾厝垵的侨乡化,现在我们通过两村的比较来考察一个非侨乡化的曾厝垵。首

先,对两村人从事工作的采访结果是趋同的,厦门都是他们的同一建设发展对象;其次,曾厝垵的祖产只保有极少的一部分,用作祭祀、扫墓以及族中有考上大学或参军时“表示”之用,以往比塔头丰厚的祖产,基本上都在解放之初和土改时被政府没收。再次,两村近年来修庙修宗祠,捐款的主力都是在村中,像曾厝垵村的村庙建设,本村有六个人每人捐了一万,而相当一部分华侨只是象征性地捐了几百几千。而且,两村的村民认为彼此已没有较大的区别;“现在都差不多了”。全球化的今天,回乡寻根的华侨,如新加坡的政务司长曾士生,回曾厝垵祭祖时并未受到热烈的接待,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为此准备许久的他就这么冷冷清清地回去了。村民已经没有了对外侨的记忆,在其它侨乡积极利用华侨资源时,曾厝垵却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厦门的身上。当厦门身上散发的魅力足够村民去追寻,与海外联系的纽带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近代曾厝垵的转型使之已不具有侨乡的基本特征。

曾厝垵素有出洋移民传统,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中国最先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更造就了曾厝垵向海外移民的兴盛。而当曾厝垵自身的推力和东南亚的吸力逐渐消退,受到战争以及政治等客观因素阻窒的同时,厦门发展兴盛起来,它重新找到了新的定位和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那就是与整个厦门同步。曾厝垵融入厦门,它更在乎的是进入都市网络以及厦门给它的机会,与海外的联系纽带反而不再重要,曾厝垵慢慢失去了侨乡的特色。

弹指一挥间,如今的曾厝垵已经是人们眼中珍珠湾海滨的一部分,厦门美丽环岛路的一站,大厦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环节。2005年12月初,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发文,要求曾厝垵的渔业逐步退出,曾厝垵的村民将别离海洋。曾华荣老人做的那艘让子孙后代记住那段辉煌的帆船模型,也只成为了一个象征符号。在改革开放步伐逐步加快的今天,厦门市“村改居”进程已经全面启动,曾厝垵将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厦门市”的一部分,它的未来也更将与整个厦门市的发展紧密相联。

参考文献:

[1]李国暉:《侨乡研究与华侨华人学的建构》,载胡百龙等主编《侨乡文化纵论》,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

版,第18页

[2]程希:《侨乡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载胡百龙等主编《侨乡文化纵论》,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38页

[3][清]《鹭江志》薛起凤主纂:辑佚补缺卷之二港澳,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

[4][6][11][14][24]《厦门志》清道光十九年镌,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卷三兵制考,卷四防海略,卷十五风俗记,卷四防海略,卷十六旧事志

[5][9][18]《厦门交通志》,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页26、26、83

[7]顾海著《厦门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45页

[8][明]张燮著《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页

[10][12][16][25][27][29]《厦门华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页11、24、63、27、207、30

[13]《厦门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第223页

[15][21]郭瑞明著《厦门侨乡》,鹭江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页27、90

[17]张镇世:《厦门民办汽车交通事业的始末》、《厦门文史资料》第二辑:110页

[19]《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20页,

[20]《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44、45页

[22]林金枝、庄为玠主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458-460页

[23]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第171页

[26]《福建华侨档案史料》,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1947年到1949年华侨出入国统计表

[28]《福建省华侨志》,福建省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12月,上篇第51页

[30]《福建侨乡调查》,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25-26页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